

热历史

# 春雨“润物细无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笔下的一场春雨，穿越千年时光，仍带着画意，沁着诗意，留在人们的心间。

春雨为何“润物细无声”？这是因为春天来临后，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成为冷空气和暖气流频繁交锋的主阵地。暖气流从海洋带来充沛水汽，与南下冷空气相遇，形成锋面。当暖气流势力相对较弱、冷空气推进缓慢时，容易产生连续性降水、雨势通常较为轻柔，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绵绵春雨”。3月多阴雨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之一，一个月有近半个月时间都在下雨，且降雨多淅淅沥沥、细密绵长。

北方的春雨则有所不同。比如，华北地区春季降水稀少，3月~5月平均降水量仅50毫米~100毫米。春季前期暖气流柔弱，难以占据华北地区，强劲而干冷的西北风快速掠过，天气现象常表现为大风、降温。仅在大气中水汽较充足且存在辐合上升运动时，才可能产生短时弱降水。因此，北方的春雨更多时候是“小雨润如酥”，降水量级不大，强度也不强。

从历史统计数据看，春雨在地域分布上，南方多于北方；在时空上，春季前期降水相对较少，后期随着暖气流增强逐渐增多；在强度上，整体偏弱，但南方偶有短时强降雨、雷暴等强对流天气。

“春雨贵如油”。在北方，春季承接秋、冬两个少雨季节，气温回升快，大风天多，蒸发强烈，易形成连续干旱。此

时，越冬作物返青至乳熟期需水多，玉米、棉花等播种成苗也要求充足水分。此时如有雨水降临，特别是出现连续两三天绵绵细雨，土壤得以补充水分，有利于夏粮生产。在南方，春雨为早稻播种育秧、谷类作物生长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条件。因此民间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

“二月休把棉衣撤，三月还有梨花雪”。春分过后，天气渐暖，可气温却经常起伏，乍暖还寒，尤其春雨来临时更感湿冷。此时正是冬季风转向夏季风的过渡时节，冷暖空气频繁交替。在这一时节，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外出时根据天气情况携带雨具，注意保暖防潮，避免因气温变化引发感冒等疾病。 (《人民日报》)



▲ 蓑衣

## 史海钩沉 古代铜钱减重掺假之谜

所谓古代铜钱做假就是偷工减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减轻钱币重量，二是原料掺假。

钱币造假最早出现在西汉文帝时期，自此之后，私铸、盗铸铜钱之风便屡禁不止，离奇的是，官府和民间均有私自铸造钱币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古代铜钱的性质有直接关系。

唐代之前，铜钱是以铜的重量命名并确定其价值的，一经国家确定后不能改变，铸钱就是增加财富，越多越好。但是，铜材是有限的，因此，在铸钱时，为了牟取更大利润，通常会偷工减料。

比如，西汉初年，沿用重量为十二铢的秦半两钱，但由于铜材不足，铜钱严重匮乏，于是，铸造的半两钱其实只有八铢重。后来，更是逐渐减轻重量，铸造四铢半两和三铢钱；还有将重十二铢的钱熔化，做成三铢重的半两钱当成十二铢重钱用的现象。如此混乱的币制直接导致民间盗铸私铸钱币行为猖獗。

汉武帝时期进行了货币改革，废除半两钱，铸造新型的五铢钱币。但是，东汉末年，董卓当政时又将五铢钱改成了一枚重，货币顿时贬值了四五倍。钱币像

鸡的眼睛那么大，称为“鸡目五铢”。此时，民间钱币私铸也蜂拥而起，这种钱币不仅小而且铭文几乎看不清楚。

西汉王莽时期，曾推行了几次钱币改革，发行最多的是“大泉五十”，一枚大泉五十相当于50枚五铢钱。《汉书·王莽传》中记载：“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说的是当时官民私铸钱币之风极盛。私铸的“大泉五十”是民间自制模板仿造的，不但不如官钱那么精致，而且文字扭曲，钱本身的重量也很小，但即便是这样的钱币，也依旧能在民间流通。

到了唐朝，以重量为钱文的习俗被废除，钱文改为通宝制。钱币的面值有小平（一文钱）、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之后，历代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私铸铜钱，这些私铸钱的特点就是尺寸小、重量轻，且钱文不够清晰有力，铜质不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铜钱的特殊性质，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铸造的钱币其实都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因此，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减重和铜质不纯的粗拙钱币基本都是当时的私铸钱币。

(《石家庄日报》)



连载

鸟书，又可称为“鸟虫书”“鱼书”“鸟篆”，是在篆书结构中改造原有笔画，使之盘曲如鸟虫形。鸟书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吴、越、蔡、楚、宋、徐等国，常见于青铜器、玺印和石刻上。东周时期“鸟书”类文物在山西地区发现极少。1961年万荣县后土祠附近贾家崖出土的错金鸟书戈，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和南方吴国较为密切的政治联系。吴国是晋国在南方为对付楚国而扶植起来的国家，它的铸造时间应在公元前585年~公元前526年之间，距今已有2500多年。万荣鸟书戈出土地点紧邻东周魏国汾阴故城址，是这座古城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重要见证物之一。

###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上古时期发生的一次重要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黄帝与蚩尤之战，是两个部族为争夺中原自然资源而引起的纷争，极可能是为争夺“盐”这一稀缺的资源，即为控制河东盐池。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河东盐池位于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表露于地面日晒风成，便引起各部族格外关注。

历史学家徐旭生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黄帝族和炎帝族是华夏集团中的两大支，他们都是从今陕西西部、北部和甘肃东南部一带的少典和有蟠(ji à o)两个互通婚姻的氏族分离出来的。《国语·晋语四》曰：“昔少典氏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帝族的发祥地在今天陕西黄土高原上，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族的发祥地在今天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畔姜水，得姜姓。这两个氏族互通婚姻，繁衍生息，发展成了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两个部落之间建立了联盟关系。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或是因为人口增加需要向外迁移，或是为了寻找更为优裕的生存空间，两部落各有一部分向东迁移。黄帝部落顺着北洛水南下，到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进入河东地区。河东地区位于黄河之曲的三角地带，地处黄土高原的南沿，土壤肥沃，沟洫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疑是一片宜耕、宜猎、宜牧的沃土，尤有天然盐池之利。为了留居河东，轩辕黄帝在河汾交汇处的脽丘占地为坛，祭祀后土之神，以期得到神灵的庇佑。

最早记载涿鹿之战的《逸周书·尝麦篇》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蚩尤乃逐帝”中的“帝”是指赤帝，亦即炎帝。九黎族的故事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炎帝族也迁到了这一带，两族为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蚩尤族打败炎帝族，炎帝族遂向黄帝族求援，黄帝族和炎帝族便联合起来与蚩尤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黄帝族打败蚩尤族以后，和太昊、少昊两族修善关系，在中原地区扩大了影响。炎帝族欲与之争夺部落间的主导地位，于是黄帝便“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阪泉之战后，黄帝族与炎帝族联合，成了华夏族的主体，炎帝和黄帝被称为华夏族的始祖。 (10)

### 汾阴铜器

万荣后土祠所在的地方，古称“汾脽”。据《说文解字》，脽的意思就是现在的通行字“臀”，用在地名指的是一个隆起的地方。《水经注》卷六记载：“（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谓之汾阴脽。”又载：“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宝物之精上见，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获宝鼎焉。迁于甘泉宫，改其年曰元鼎，即此处。”在元鼎四年六月，后土祠旁又出土宝鼎，《旧唐书·地理志》载：“宝鼎，汉汾阴县……开元十一年，玄宗祀后土，获宝鼎，因改为宝鼎。”

该件铜器后为史学家潘祖荫所收藏，著录在他的《攀古楼彝器款识》中，注明是“同治庚午四月山西荣河县后土祠旁河岸圮出”，因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齐国重器，器主是齐国宗室，故名为“齐罍”。该器现藏国家博物馆，体型很大，高67厘米，重65千克。

同治年间就收得其中若干件铜钟的潘祖荫，在《攀古楼彝器款识》中著录四件，命名为“郟钟”，说“此钟咸丰年间河岸边出土”。后来吴大澂的《窳(k è)斋集古录》著录“郟钟”七件。《山西通志》记载共12件，现在分别收藏于3处，即上海博物馆收藏10件，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大英博物馆1件。这些都著录于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从大到小依次编为1号~12号，最大的高43厘米、重9千克，最小的仅高24厘米、重2.59千克。

王国维指出出土地点与铭文内容的联系：“此器出荣河者，盖春秋时魏氏采地实奄有河东之半，自河北（春秋前魏国故地）以北、永安以南、安邑以西，西讫于河，皆魏地也……今荣河为汉之汾阴县地，今永安与河北之间，魏氏之器出土此，固其所也。”

1958年，这里又出土过青铜器，主要收获是铜鼎9、铜钟9、铜尊1、铜罍2、铜鉴2、铜匣1、铜簋2、石磬10。青铜器全都没有铭文，而且器壁极薄，大都被坍塌的椁顶砸毁，完整的仅有6件铜钟。

1961年，附近贾家崖的黄河断崖上发现数十件青铜器，能够辨认出器形的有50余件，有鼎、鬲、簋(fǔ)、铎、鉴、甬钟等。在这批铜器里，有两件当时即受到重视，张颌先生对其重点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两件错金鸟书戈一模一样，铭文为“王子于之用戈”。同时认为吴器在晋地出土颇多，说明吴国与晋国关系密切，印证史书上记载的两地交往，说明春秋时期南北两地的交流已经很顺畅频繁。

范 (山西博物院藏) 夏县禹王城出土的五铢叠铸陶 本版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